

# 调整与完善 继承与创新

## ——论建国以来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进

王 雷

[内容提要]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进是一个不断调整与完善、反思与变革、继承与创新的发展过程。其根本动力来源于中国人适应内外安全形势变化,应对各种安全挑战与问题,摆脱安全困境与风险的一种需要。不管这些挑战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一旦现有的安全环境与安全观的和谐关系被打破,新的国家安全观也就获得了生成的时机和条件。

[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 安全战略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4)06-0031-07

近些年来,随着各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在理论层面对安全、安全观、安全环境、安全结构以及安全战略的内涵、特性有了更加细致、准确的把握,这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综合研究,宏观把握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就现实意义而言,当前中国内外安全环境正在经历复杂深刻的变化,面对各种新的挑战与风险,需要我们对国家安全观的演进历史进行系统的回顾、分析、总结和思考,以便为中国新时期制定安全战略、推进和平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必要的知识贡献。

本研究是关于中国国家安全观演进的动态评估,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哲理思考。本文将分七个时期论述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过程,每个时期重点考察四项内容:一是该时期中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和形势;二是该环境下中国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认知和判断;三是该时期中国对国家利益、自身实力、角色地位、权利义务的理解和定位;四是中国制定安全目标、政策、战略,选择维护手段的观念和思想。<sup>①</sup>通过对各阶段的比较和分析,笔者试图对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变迁机理、基本经验作出概括和总结。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安全观(1949—1956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获得了主权独立与自主,但是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并不理想。从外部来看,由于美苏陷入冷战,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面临两极对抗的严峻态势。1950年朝鲜半岛爆发战争,随着美国将战火烧到鸭绿江,并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中国在亚洲冷战中首当

其冲,遭到了西方的外交孤立和军事封锁,对外政策的回旋余地大为受限。从内部来看,一些地方还没有解放,匪患没有肃清。在解放区国民党特务仍在从事破坏活动,在台湾蒋介石不断叫嚣反攻大陆。新中国虽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是需要尽快恢复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国防。大的背景和结构性因素决定了国家需要尽快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如此,随着内外环境的转变,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新的挑战,无论是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列主义信仰和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现代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需要依据情势作出调整,以适应新时期政治发展的需要。

受上述因素影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很快形成了一套应对内外挑战、维护国家利益、指导政策战略的安全观:(1)对时代主题的把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受列宁革命理论的影响,认为世界仍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能避免。新中国对战争的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怕,认为只要在物质和精神上做好准备,世界大战是可以制止和拖延的。<sup>②</sup>(2)对安全威胁的判断。外部主要是担忧帝国主义突然发动侵略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美国扶植日本、侵占台湾,对中国进行核讹诈,新中国对政权生存、外敌入侵的担忧与日俱增。内部威胁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国民党特务的潜伏、破坏活动和蒋介石的反攻计划;二是反革命势力对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干扰;三是国民经济贫穷落后无法为政治、国防提供有力支撑。此外,受意识形态对抗因素的影响,新中国还高度关注思想战线上的颠覆活动。毛泽东多次告诫全

党,要学会同不拿枪的敌人进行斗争,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3)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敌我关系的识别。在这一时期,严格按照意识形态划线,总体来讲,两者的关系是一致的。受内外局势影响,新中国高度重视政治、军事安全,但是经济、思想、社会制度均被视为国家利益需要维护的组成部分。(4)对国家实力、角色的定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认识较为客观。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强调,“不要四面出击、要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迅速战胜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sup>③</sup>。显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迫切希望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希望将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上述安全观在安全目标、政策的制定以及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就安全目标来讲,当时内外政策的中心任务无疑是巩固新生政权,争取国际承认,恢复国民经济,并为随后开始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以及发展对外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着中苏建交并签订同盟协定,新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打破了敌对势力的孤立与封锁。不仅如此,在苏联的援助下,全国上下艰苦奋斗,取得了抗美援朝的重大胜利,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

这一时期的安全观无疑有利于新生政权的生存和巩固,但就长期发展而言,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显然,新中国当时对外交往的对象主要是苏东国家,外交失衡不利于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sup>④</sup>此外,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当时可以借鉴的只有苏联模式,由于对其依赖过重,一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深刻地表现出来。

## 二、社会主义曲折探索期的国家安全观(1956—1969年)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三和、两全”的新路线。<sup>⑤</sup>中苏两党随后在政治路线、外交方针、国际形势等问题的判断上出现分歧。1956年波匈事件导致国内对于阶级斗争的严重程度估计过高,中共在全党范围陆续开展了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由于没能加以控制,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sup>⑥</sup>在国际层面,随着中国离心力的增强,苏联试图将中国重新纳入其全球战略的轨道。双方在“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击金门”、“中印冲突”等问题上激烈碰撞,两

党分歧逐步公开化,直至演变为两国关系的分裂和恶化。中国由此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陷入对抗。在中国国内,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也日趋激进。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中国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当时还缺乏必要的经验和思想准备。

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国家安全观出现了以下调整和转变:(1)对于时代主题,新的看法是世界动荡、分化、改组的结果造成了两种可能性——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显然,这里一方面判断世界革命正处于高潮期,帝国主义和旧的秩序将被彻底摧毁;另一方面继续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在增加。(2)对于安全威胁的判断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认为美苏有能力、也有意图发动针对中国的军事打击甚至核打击,强调不能排除外敌入侵的可能性。二是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仍然对中国极端敌视,中国要反对敌对势力大搞“两个中国”,警惕和防范“和平演变”。三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反修防修”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新焦点。中国领导人愈发担忧,如果放松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中国存在变成“修正主义”或者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风险。(3)对国家利益的界定,这一时期依然按照意识形态来划线,但是二者的关系已经开始不匹配,总体来讲,经济安全从属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关注度显著降低。(4)对自身实力、角色地位的定位,毛泽东等人提出了新看法:首先是认为苏联已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国自然成为领导世界革命新的中心。其次是强调力量对比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更是人力的对比”,认为“中国人口规模比美国大,土地面积与美国相当,加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理应为世界革命作出更大贡献”。<sup>⑦</sup>

安全观的上述转变为新时期中国安全目标、政策的制定以及手段、战略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指引。就安全目标而言,对内任务聚焦于巩固革命胜利果实、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发展道路的纯洁性;对外则强调推进世界革命,积极援助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与此相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层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新做法: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的正确论断,强调阶级斗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sup>⑧</sup>受此影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武装斗争取代和平建设成为各项工作的主线。随着“左”倾思想的不断蔓延和恶性发

展,中国试图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跨越式发展,为此先后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对外政策、战略领域,为了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中国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面对美苏的双重威胁,中国采取了“反帝反修,两个拳头打人”的新战略。

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存在诸多问题。夸大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对世界革命的前景过于乐观,高估了自身的实力;与美苏同时为敌,导致外部安全环境急剧恶化;夸大了“和平演变”的危险性,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国内“左”倾思想恶性发展,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革命化的意识形态严重干扰内政外交工作,对外输出革命引发外交关系紧张混乱,忽视经济建设导致国家发展严重滞后。显然,中国需要改善自身的安全处境。但在当时,国家安全观尚不具备转变的条件和机遇。

### 三、“文化大革命”反思期的国家安全观(1969—1978年)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内外形势再次发生显著变化。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但很快陷入战争泥潭,不仅国力受到严重消耗,也招致国内民众的反对。随着反战运动日益扩大,美国国内外处境愈发困难,维持霸权、应对苏联挑战开始力不从心,需要调整对外政策。几乎同一时段,苏联的军事实力及综合国力获得了迅速发展,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力量对比逐步朝着有利苏联的方向发展,美苏争霸也相应地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新局面。不仅如此,随着自身国力的大幅跃升,苏联在世界各地到处伸手,力求取代美国、称霸世界,同时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和政治控制。在此背景下,中苏关系急转直下,两国不断发生边境摩擦,直至在珍宝岛爆发军事冲突。此后,苏联针对中国的战争舆论明显增多,甚至私下向美国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在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停滞、外交关系陷入混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开始有意识地调整政策,试图扭转这种不正常的状况。

上述形势及其变化为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观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从1969年开始,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安全观念上逐步形成了一套新的看法和观点:(1)对于时代主题,一是认为世界革命正在蓬勃发展,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二是强调新的世界大战的风险依然存在,全国上下要在精神上作好打仗的准备。中苏冲突爆发

后,“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在这个时期达到顶峰。(2)随着来自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中国越来越倾向于判定,与自己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已成为中国最现实、最危险的敌人。在中国内部,对西方“和平演变”的担忧依然存在,但是对于国家可能转向“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担忧更为警惕。(3)尽管意识形态标准对界定国家利益、发展对外关系的影响仍然存在,但是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发展、经济安全的紧迫感较上一阶段有所上升,但总体来讲,它们仍然从属于传统的军事、政治安全。(4)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和论断。中国首次将自己和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定位为“第三世界”。显然,在各种现实困难面前,中国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中国国力较为有限,维护国家安全不能简单地按照社会制度来划线,应该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

随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淡化,中国制定安全政策、对外战略的标准开始向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方向转变。从内部来看,九大后中国共产党修改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将国防建设摆在首位,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发展尖端武器,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备战”的新方针。至此,战备已成为全党、全国的核心工作。“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仗”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行动。从外部来看,为了缓和苏联的威胁,毛泽东抓住时机,对美开展“乒乓外交”,随着尼克松成功访华,中美结束了彼此长期对峙的局面。不仅如此,中美关系戏剧性的变化引起了连锁反应。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又迎来了第二次建交高潮。随着对外关系新格局的逐渐形成,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新战略,即建立从日本到西欧,最后到美国的联合抗苏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总体来讲,20世纪70年代中国安全观的调整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外而言,尽管在某些问题上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但是中国逐渐成为国际上—支公认的独立力量,取得了相对主动的战略地位,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冷战的束缚,外交活动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对内而言,尽管“左”的路线在毛泽东去世之前仍旧居于主导地位,但它实际已成为强弩之末,难以为继了。<sup>⑨</sup>随着外部环境的逐步改善,中国社会开始反思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种种迹象预示,中国国家安全观正在孕育—次大的转变。

#### 四、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安全观 (1978—1989年)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局势再次发生新变化。美苏关系在对峙与缓和交织中呈现缓和为主的新态势。两大阵营内部也出现了新的分化与改组。就对外关系而言,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在改善,但中苏关系仍处于低谷。1978年苏联与越南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合作条约,支持其入侵柬埔寨,1979年又对阿富汗发动侵略战争。苏联的上述行为加剧了中国对局势的担忧。不仅如此,随着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增多,中国愈发感觉到自己与发达国家、周边新兴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在拉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社会开始反思前30年的曲折经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未来各项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随着上述形势的转变,中国国家安全观迎来了新一轮反思与调整:(1)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认为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是可以维护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sup>⑩</sup>(2)中国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认识到在这样的体系中,国家之间既有斗争也有合作,存在共同利益,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互相影响、不可分割。因此,中国需要对外开放,不能再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了。(3)对安全威胁的判断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认为中国经济落后是危险的,如果不摆脱这一局面,最终会危及国家安全、政权安全。二是判断当时世界仍不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各个地区动乱的主要根源,中国也深受其害。三是认为改革过程中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险。不过,对“和平演变”、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较毛泽东时期要客观和务实。(4)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中国开始主张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邓小平强调中国不打美国牌、苏联牌,也不许别人打中国牌,主张依据事情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5)对于自身实力和角色的定位,一是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二是承认在苏、美、中“大三角”格局中,中国的力量还很单薄,但是认为独立自主的中国在多极格局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sup>⑪</sup>

随着上述安全观的转变,中国在安全目标、政

策、战略的制定和选择上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办法:首先,指出国家的内部任务主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经济建设是解决内外问题的基础,全党、全军要服从大局,争取和平、争取时间,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环境。这一时期中国进行了百万大裁军,针对台湾和香港问题,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新构想。<sup>⑫</sup>其次,明确了外交政策的两个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二是提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强调新秩序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第三,在对外战略上,中国逐渐放弃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旧战略,开始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新战略。为了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在力争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同时,中国也试图推动中苏关系向正常化转变。在同西方、东欧、第三世界国家加强政治经济合作的同时,中国也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动力不仅来自政治、经济变革进程的实际需要,也来自对以往历史经验、教训的学习和反思。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与外延也在变化,非国家角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开始显现,安全问题也日益呈现复杂性。种种迹象表明,传统安全观念及其安全战略已显示出狭隘的一面,需要不断调整和创新,以适应内外局势的快速转变。

#### 五、冷战结束初期的国家安全观 (1989—2000年)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的安全环境发生突变,外部遭遇了苏联解体、两极世界变成单极的巨大冲击,内部面临着经济滑坡、改革放缓的不利影响。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虽然这种尝试很快宣告失败,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此外,新时期影响国家安全的非传统因素在增多,经济一体化、对外依赖的增强引发了人们对经济、金融安全问题的密切关注。台独、藏独、东突势力逐渐活跃使得人们对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的担忧开始增加。在意识形态领域,随着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国内对于国家性质、政治制度、发展方向的争论再度兴起。不过,在全球化和中国愈益卷入世界体系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一种新的、有益的复杂性,即强调尊

重国际体制、注重跨国交往、信任多边合作的“国际主义”新成分已经注入到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影响愈发显著。<sup>③</sup>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家安全观迎来了新的调整和变迁:(1)邓小平率先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指导思想,强调中国搞好自己的事,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2)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论断,强调世界虽然并不安宁,多极化道路发展曲折,但是世界大战在可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是可以实现的。(3)面对安全内涵和外延的不断变化,中国领导人开始主张树立综合安全的思想和观念,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为标志,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人民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受到了明显的关注和重视。(4)对于安全威胁,新的判断侧重于五方面:一是强调西方七国的经济制裁和干涉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最新表现;二是认为中国如果不加快国防现代化,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或者卷入海湾战争这类的高技术战争,很可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sup>④</sup>三是担忧经济滑坡影响增长速度,危及社会稳定,影响政治安全;四是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和颠覆,主张改变经济发展一手硬、意识形态建设一手软的失衡做法;五是认为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的活动能力和破坏性在加大。(5)对自身实力和角色的定位,中国提出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指导思想,但也强调,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有所作为”。

与上述安全观念转变相对应,中国安全政策、内外战略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出现新调整:首先,明确国家的中心任务仍然是改革开放,需要专心致力于经济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积极加入国际组织,签署国际协定,为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在外交领域,中国大力开展睦邻外交,实现了同亚洲国家的全面建交,利用矛盾打破了外部封锁,恢复和稳定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同时,中国积极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与俄罗斯、法国等大国积极发展伙伴关系,高度重视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1997年中国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关系上,进一步突出了国际安全的价值和主体地位,并且成功将其应用于实践。在军事战略领域,中国的指导思想开始向准备并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

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方向转变。中国再次裁军50万,对于台湾问题,中国表示争取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总的来讲,这一时期的中国国家安全观对以往的经验教训作了很好的反思、学习与继承。由于对安全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判断准确,中国很快摆脱了冷战结束初期的不利局面,有效地应对了内外的风险和挑战,实现了国家的持续发展。不仅如此,中国在安全观领域还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实践,树立了综合安全的思维和意识,提出了具有时代影响的新安全观,这为日后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 六、21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安全观(2000—2010年)

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转变。首先,随着欧盟一体化的加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兴起,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愈发明显,不过美国仍旧维持着霸主地位,国际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的新局面。其次,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逐步呈现新动向:战争作为维护国家利益有效工具的价值迅速衰减;国际关系的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软实力问题;国际经济、政治互相依赖不断加深;不同国家内部社会形态、基本价值、政策观念的同质性显著增多;各种跨国非传统威胁和全球性问题愈益凸显。<sup>⑤</sup>再者,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是内部也面临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深化各领域改革的新挑战。与此相对,外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不绝于耳。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竞争和对抗仍在延续。但是,国际主义、大国责任、共同利益这些新观念正在改变中国人对自己和世界的传统看法。

受此影响,中国国家安全观迎来了新的调整和转变:(1)对局势和时代的看法。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维护和平的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2)对于安全威胁,新的判断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认识到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使得国家安全观的内涵迅速扩展,<sup>⑥</sup>恐怖主义、重大疫情、环境污染这类新问题使得国际安全、人类安全、个人安全日益成为国家安全观的新主体以及安全价值的重大关切;二是强调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从

驻南使馆被炸,到中美南海撞机,再到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中国对此的担忧愈发明显;三是认为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内外瓶颈问题的共同来源,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危及国家的持续崛起和政治安全;四是认为“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强调思想文化领域是敌对势力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重点领域,中国愈发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3)对自身实力、角色地位的评估。这一时期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同时努力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强调国情决定了自己将长期致力于发展和民生问题。

随着上述安全观的调整与发展,中国安全政策、内外战略的指导思想也出现新变化:对内,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国在注重人民安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将对人的安全问题的关注提高到了新层次,维护人的安全日益成为国家制定安全目标、政策、战略的重要着眼点。对外,随着“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中国对国际安全、人类安全、整体安全、合作安全的重视已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发展的权宜之计,而是成为中国主动追求的一种价值和理想信仰。不仅如此,2011年中国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对外正式宣布自己的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sup>⑦</sup>国家核心利益的明晰既是中国国家安全观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又是影响其进一步演进的重要因素。显而易见,21世纪的中国国家安全观正在向综合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方向演进。

## 七、大安全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2011年至今)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内外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尽管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但是霸权主义、冷战思维、中国威胁论并没有就此消失。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中国的方向转变,美国开始重返亚太,提出战略再平衡,对中国崛起进行遏制。在周边地区,日本、印度、东盟国家也试图对中国的影响力进行制衡。受此影响,中国周边的海洋领土权益争端日趋复杂和棘手,地区敏感问题频繁发作也削弱了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性。此外,来势凶猛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加大了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外部面临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冲击,内

部承受着“保增长、调结构、拉内需”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挑战也愈发严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危害在加大,国家面临的经济、金融安全风险在上升,腐败、贫富差距、发展失衡问题亟待解决,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生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毫无疑问,新时期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安全问题空前复杂和多变;但另一方面,既有的安全观及其体制机制适应变化、应对挑战的能力还显著不足。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国家安全观必须与时俱进,作出新的转变。

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他指出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他还进一步明确了贯彻和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求:一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二是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三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四是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五是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sup>⑧</sup>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大安全时代的一种国家安全大思路,从哲学思辨、历史经验和系统思维的高度揭示了中国当代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sup>⑨</sup>对中国新时期确立安全目标、制定安全政策与战略、完善安全体制和机制、推进各项安全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 八、结论与启示

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进是一个不断调整与完善、反思与变革、继承与创新的发展过程。其根本动力来源于中国人适应内外安全形势变化、应对各种安全挑战与问题、摆脱安全困境与风险的一种需要。不管这些挑战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一旦现有的安全环境与安全观的和谐关系被打破,新

的国家安全观也就获得了生成的时机和条件。应对挑战需要推动既有的国家安全观作出调整与变化,新的关于安全问题的认知、思考和价值取向为国家新时期制定安全目标、政策和战略,以及个人和国家从事安全实践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导,促使安全环境与安全观重新恢复平衡关系,进而将个人、国家、社会适应安全环境及其变化的能力,以及维护自身安全状态和安全质量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应对挑战的过程远比想象的要复杂。概括地讲,前30年中国国家安全观基本上是一种“求生存”的安全观。中心任务就是要捍卫革命政权,保卫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在此背景下,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都比较集中和单一。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当时在处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如何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安全与发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上,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但是,没有这个阶段的实践与探索,没有相关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很难设想,中国在随后的30年能够迅速地作出调整,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符合改革开放需要的“谋发展”的安全观。同样,如果没有前后60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对安全问题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全面、系统、深刻的理解。总体安全观是一种“要复兴”的安全观,它来源于对过往经验的反思、总结、批判和创新。

总结60年的经验与教训,新时期中国塑造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树立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的安全价值和观念,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持孤立、对立的简单思维方式无助于安全观的发展与完善。二是保持竞争与批判的意识。事实表明,没有竞争就分辨不出优劣,安全观会失去进化的动力,没有批判就无法取舍,安全观会失去发展的方向。三是发扬学习与创新的精神。学习就是要吸收和借鉴所有文明的优秀成分,但不能照搬和照抄,要尊重具体国情。创新是安全观发展与完善的灵魂。历史证明,中国国家安全的每一次重大飞跃既离不开传统经验的创新式继承,也离不开外来经验的创新式发展。四是增强危机与忧患意识。面对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要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

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只有具备了上述几项关键条件,国家安全观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指导安全实践的能力才会大幅提升。

注释:

① 本文对国家安全观定义及其内涵的理解如下: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国家对安全的主观认知,是有关国家安全的理论。它包括国家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的认识和评估;对其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与挑战的判断;对自身利益、实力、角色的认知及其所承担的义务和所应享受的权利的认识;是国家确立安全目标、制定安全战略政策、选择维护安全手段的指导思想。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24页。

④⑨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⑤ “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否认了列宁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两全”即“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模糊了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将无产阶级的政党改成“超阶级”的政党。

⑥ 《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页。

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页。

⑧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斗争,未来的工作重心是经济文化建设。

⑩⑪⑫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第105页,第356页。

⑬ 参见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载于《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

⑭ 江泽民《国际形势和军事战略方针》,参见《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⑮ 时殷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战略思想——意识形态基础、根本战略纲领和当今所遇挑战》,载于《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

⑯⑰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9月6日《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

⑱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参见新华网2014年4月15日。

⑲ 刘跃进《大安全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参见2014年5月19日《北京日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责任编辑:文丁]